

对中共“一大”代表人数的新质疑

解 光 一

“一大”代表的人数问题，近年来“十三人”说大有代替“十二人”说的趋势。但是，我在接触有关材料时产生了以下疑问：“一大”代表就是十二个或十三个吗？他们代表的党员，全国就只有五十多个吗？出席“一大”代表中有没有江苏代表呢？

党史工作者十分重视“一大”代表人数的争论，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多一个或少一个代表的问题，而是涉及到在党史编写和教学中要不要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以什么观点来看待党在初创时期各种现象的问题。

如按现在一般的说法，出席“一大”各地区的代表有十三人。他们是：

毛泽东、何叔衡，湖南代表或称长沙代表。

董必武、陈潭秋，湖北代表或称武汉代表。

王尽美、邓恩铭，山东代表或称济南代表。

陈公博、包惠僧，广东代表或称广州代表。

周佛海，留日代表。

张国焘、刘仁静，北京代表。

李 达、李汉俊，上海代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前面四个地区的代表，既可冠以省区，也可以省城称谓，而李达、李汉俊习惯上都称之为上海代表。尽管当时上海属于江苏地区，而用江苏代表的提法，却从未见诸党史记载。什么原因？江苏除上海外，还有没有共产主义小组？它们有没有选派自己的代表出席“一大”？我的回答：有。

解放初，为了了解我父亲解慕唐烈士的革命活动；最近几年，又因为镇江烈士陵园、徐州革命文物领导小组、邳县编史修志办公室委托撰写几位革命烈士的传记，我查阅了一些档案，作了一些调查访问，发现南京和徐州在1920—1921年间，均有党的组织，并且在“一大”召开前夕，接到了出席“一大”的通知，派出了自己的代表，代表人数是徐州和南京各一名，也符合当时一个省区不超过两名代表的原则。

1921年，徐州有党的组织，它的产生也决不是偶然的。十月革命的炮声，“五四”运动的惊雷，首先震撼了中国的知识界。各地马列主义研究小组，如雨后春笋，破土而出。地处南北交通中心，政治上又极敏感的“五省通衢”徐州，也受到了新思潮的巨大影响，江苏省立第七师范的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开展读书运动。1920年产生了自由结合的学习、研究马列主义的小团体（也可以用习惯讲法，称共产主义小组）。其主要活动就是读书、探讨。开始

时，也读了些无政府主义、空想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，主要的还是阅读《新青年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等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。当时参加的人员有：陈亚峰、解慕唐、郭子化、戴蔚霞、徐怀云、苏鸿鉴、张继超、冷其英等十余人，并与北大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，常互寄书刊，交换意见。北大也派专人前来指导。在1920年、1921年间，李大钊、陈独秀就曾派北大学生毕瑞生、陈德荣先后多次来徐。徐州七师除和北大联系外，还和湖南一师(长沙)、山东一师(济南)、浙江一师(杭州)等全国较有影响的学校互有联系，寄赠书报。

1921年初，以共产主义小组为核心，建立了公开的群众组织——赤潮社。社员发展到三十余人，苗如椿、梁以植、刘荣芹、周西林等都参加了，并创办了《赤潮旬刊》，主要负责人为陈亚峰、解慕唐、张继超、苏鸿鉴、徐怀云等数人。该刊出版四期，便被当时直系军阀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勒令停刊。

七师校长陆裕冉，对“赤潮社”的骨干，本来就十分仇视与害怕，一向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直欲除之而后快。此时更与军阀相勾结，突然贴出布告，开除十余个学生。

布告贴出后，激起七师同学义愤，纷纷拥向校长室，要求校长收回成命。当学生的要求得不到重视和解决时，在“赤潮社”的发动下，成立了七师学生会、徐州八县学生联合会，决定罢课，声援被开除同学；并发表宣言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决定开除校长陆裕冉，并将其驱逐出校。学生占领学校达三月之久。事情闹大之后，陈调元也不敢采取镇压手段。后来还是由教育厅出面，撤销陆裕冉的校长职务，另派新校长邳人张宏业来徐，接受学生要求。

由于建立正式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，在北京的李大钊又派陈德荣再次来徐，帮助建立党的组织，当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徐州支部，时间在1921年的5、6月间。这个支部还得到通知，选派一名代表去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为了出具介绍信，经由苏鸿鉴，通过他在刻字店的亲戚刻了一枚图章，图章的图案是根据那时《新青年》的封面：地球前对握着的两只手，象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，上面用中、英两种文字刻着“中国共产党徐州支部”。

这枚图章由张继超负责保管，周西林曾亲眼见到过。后因徐州党组织迭遭破坏，几经转移，到了乡下，由于保管人害怕，将它毁掉了。

徐州出席“一大”的代表是陈亚峰。陈亚峰赴沪途经南京时，便与南京代表（一说为暨南师范学生郭青杰；一说为刘真如）同行。抵沪后，曾与出席“一大”的其它地区代表酝酿讨论组织章程。但在谈到党的纪律时，由于南京代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，不愿受党纪约束，中途退席，并挽陈返徐。从此，徐州支部就和中央失去联系，直到1923年吴亚鲁来徐才又恢复了党组织。

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是成立大会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。它的划时代意义，在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中，没有任何重大事件可以与之比拟。同时，我们也应看到，“一大”既然是成立大会，又是第一次全国性的会议，没有经验，又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，并且还处在秘密活动的环境中，联络、磋商问题很不方便，所以各地代表来沪时间先后拉得很长，人来人往，会议开得比较松散。因此，不能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待六十年前的事情，对代表的产生及会议的安排也不应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。

我认为，尽管江苏两个代表不同意党的组织章程，自行退出会议，后来失去组织关系。但他们作为“一大”代表来上海参加过一些建党活动是无疑的。因此，江苏两个代表的情况很值得我们去调查、研究。